

移住者媒體的社會行動： 南韓「移住者世界電視」 發展歷程之考察^{*}

陳春富^{**}

摘要

本研究以南韓「移住者世界電視」為觀察個案，探討國際人口遷徙背景下，移住者媒體在多元文化社會發展中的角色及彰顯的意涵。透過歷時性的訪談與觀察資料，本研究發現，過去十年中，「移住者世界電視」作為連結移住社群與南韓市民社會的橋樑，開拓出以跨國移住者為行動主體的媒體參與及社會實踐途徑。藉由草根移住者媒體的培力，不同背景的跨國移住者取得發聲管道，並在相互串連中凝聚改革動能，主動介入及參與南韓社會的轉型過程。

關鍵詞：行動主義、南韓、移住者世界電視、移住者媒體、跨國移住者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跨國移住者的媒體參與及社會實踐：以南韓移工電視台的發展經驗為觀察」（102-2410-H-030-028-）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學刊匿名評審與編委會提供的寶貴修改建議。盧開明先生、尚志大學鄭義徹教授在本研究不同階段給予許多協助，在此一併表達謝忱。

^{**} 陳春富為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副教授，Email: 061328@mail.fju.edu.tw。
投稿日期：2016/11/03；通過日期：2017/03/20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在資本主義快速擴張、各國經濟與勞動型態轉變，以及媒介科技持續發展的脈絡下，全球社會已進入人口跨國遷徙與流動的年代。其中，帶動人口跨國遷徙的結構性力量中，又以經濟因素所影響的層面最為廣泛（Ngo, 2008）。隨著世界各國的經濟面臨改變及轉型，國際間勞動分工的情形亦不斷產生變化。Castles & Miller（2003: 5）指出，所謂「全球遷徙時代」（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的來臨，即指世界各地皆出現各式各樣的國際人口遷徙與居留現象，而人口國際遷徙的急遽發展堪稱當代全球革新趨勢的重要一環，並且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形塑當地的政治、文化及社會型態。

若以亞洲地區來觀察，自 1990 年代起，由於經濟型態與人口結構的改變，大量勞動人口從部分國家逐步流動至新加坡、香港、台灣、南韓與日本等高科技產業地區，從事移入國人民所拒／懼於投入的 3D（骯髒、危險與困難的）工作。另一方面，隨著新工業國家的女性積極投入職場，也提高了對於家庭看護與家務勞動力的需求，使得此波跨國遷徙勞動人口中的女性占了相當高的比例（Castles & Miller, 2003）。以新加坡為例，該國為持續推動經濟成長，對於移民及外籍工作者採取相對開放策略。中華民國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2013.03.05）一項研究報告指出，新加坡 2012 年就業人數約為 3,358,100 人，其中外籍工作者即有 1,268,300 人，占了總就業人口的 38%，顯示其對跨國勞動力的需求及積極延攬方針。

以台灣而言，根據行政院內政部統計處（2016）〈內政統計月報〉統計資料，2016 年七月底「外來人口在台居留人數」共計 696,418 人，其中「外國人」639,175 人，「大陸地區人民」44,999 人，「香港澳門居民」6,038 人，另有「無戶籍國民」6,206 人。行政院勞動部（2016）〈勞動統計月報〉的資料也顯示，若就台灣「外籍工作者」組成而言，2016 年八月底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總計 605,935 人，較前一年同期增加 23,426 人，而「外國專業人員」有效聘僱許可共計 30,061 人次；從資料中亦可看出台灣跨國勞動力的需求，主要仍是以藍領工作者為主。

至於同樣位於東亞地區的南韓，為解決國內勞動力日益短缺的問題，自 1990 年代初期即開始有系統地引進跨國移工，1994 年時人數僅約三萬人，到了 2008 年，南韓境內則有超過 70 萬持工作簽證居

留的外籍勞動者（A. E. Kim, 2009；Seol, 2000）。若再加上每年持續增加的婚姻移民，該國於 2007 年底登記在案的外籍人口數即已達到 100 萬人的規模，近兩年則成長至近 200 萬人，預估 2020 年時，南韓境內的外籍人口將高達 250 萬人（Moon, 2015）。

與台灣相同的是，南韓自 1990 年代初期開始積極引進跨國移工。雖然以目前的資料來看，所謂「外國人」只占了南韓全國約 5,000 萬人口中的少數比例，然而一般認為，南韓正逐步轉型成為一個由更多元的文化族群所構成的社會。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為南韓在 1980 年代後經歷產業與經濟的急速轉型，造成了國內勞動結構與薪資水平的大幅改變；至於另一項原因，則是南韓目前少子化與高齡化的社會現象，此種趨勢預計將持續加速該國人口的老化以及勞動人力的短缺（Choi et al., 2003；A. E. Kim, 2009；Moon, 2015）。在以上兩種社會趨勢的影響之下，未來南韓勢必需要持續引進更多的跨國移工。

此外，跨國移工的逐日增加也挑戰了南韓向來以「同文同種」為國家認同基礎（pure-blood nationalism）的傳統信念（Han, 2003；A. E. Kim, 2009；Lim, 2003）。究其原因，主要在於跨國移工在南韓停留的時間逐漸增長，人數日益成長；^[1] 加上因出生率持續降低所導致的長期性勞動力短缺問題，使得該國政府與社會大眾不得不正視未來人口與勞動結構的變化。換言之，對於跨國移工的需求已成為一項不可逆的社會發展指標，而此種人口變遷所帶來的不僅是經濟上的影響，同時也意謂著南韓勢必將從種族同質性的傳統社會，逐步朝著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方向前進。

針對此種社會發展趨勢，南韓政府擬定了多項跨國勞動力政策及移工引進方案。不過，相較於對外籍勞動力採取鼓勵、開放的國家如新加坡等，南韓向來被視為強烈以同質性的血源與文化作為民族情感基礎的國家，跨國移工只能短期停留，屬於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一群人，除了短期勞動力的經濟功能之外，並不被期待涉入或參與南韓社會事務。然而，在此種社會背景之下，過去十年間，在南韓工作與生活的跨國移工卻藉由新型態「移住者媒體」（migrant media）的培力，突破種種結構與制度的限制，透過彼此之間的串連與合作，形構成以跨國移住者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社群，並且找到對外發聲的管道。其中，「移住者世界電視」（Migrant World Television，簡稱 MWTV）即是最具指標性的個案。

「移住者世界電視」的成立與發展提供全球遷徙時代中族群媒體（ethnic media）研究幾個重要的觀察向度。其一，該組織一方面具備族群媒體概念所涵蓋的多重指涉，包括少數、弱勢、社區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人口國際遷徙脈絡下跨國移住人口特有的移動、離散與跨文化等特質（Matsaganis, Katz, & Ball-Rokeach, 2010）。其二，不同於多數以單一原生文化作為聯繫基礎、強調特定族群內部專屬的離散經驗與民族認同的移民媒體（immigrant media），「移住者世界電視」的參與成員及服務對象涵納移工、政治難民、婚姻移民、其他類型移民及留學生等多元、異質的跨國移住族群，形構了一種跨越國籍、種族與文化界線的新型態族群傳播樣貌。其三，除了關照不同身分類屬、基於不同目的而短期或長期參與居留國社會發展各類跨國移住者（transnational migrants）之外，「移住者世界電視」在組織運作上更強調在地資源的相互連結，從而展現出跨國移住人口的社會行動潛能。本研究認為，基於以上幾點特性，「移住者世界電視」的發展經驗可作為觀察全球人口遷徙背景下，多元文化社會變遷及族群傳播研究的重要參考。

有鑑於南韓在跨國移工引進背景以及未來發展趨勢上，與台灣社會呈現許多類似之處，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南韓作為觀察場域，針對「移住者世界電視」進行個案分析；透過南韓跨國移工發展背景脈絡的耙梳、相關政策方案思維的檢視，輔以訪談資料的整理，從「移住者世界電視」組織的發展經驗中，審視跨國移住者社會行動及實踐的另類途徑，以及其對當代多元文化社會中族群傳播發展所具有的意義。

貳、文獻探討

一、移住者行動主義（Migrant Activism）

人口的國際遷移為當代社會的普遍現象，而跨國勞動力的全球流動更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世界各國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影響，往往若非勞動力輸出國，也有可能是勞動力輸入國，或是兩者皆是。針對跨國移工與社會發展之間關係的解釋，在過往研究中呈現出不同的學派與觀點，而不同的觀點也凸顯出跨國勞動力背後複雜的全球文化、政治與經濟脈絡。

隨著近年來人口國際遷徙的日益頻繁及移住型態的多元發展，不

少關於跨國移工與移民的研究論述中提出以跨國遷徙人口為主體、關注移住族群與居留國社會互動關係的行動主義觀點。此類行動主義的研究取徑關注移住社群的內在主體性，主張跨國移工是由其原生文化中殊異的歷史經驗、價值體系，以及原生國與居留國之間的政治、社會、文化關係相互重構下而成的行為主體，並且得以透過有別於傳統結構框架的動員方式及集體行動，由社群內部向外擴展，以具草根性與改革動能的社會行動參與居留國社會的發展過程（Gurowitz, 2000；Kosnick, 2007；Nyers & Rygiel, 2012；Rigoni & Saitta, 2013）。

Nyers & Rygiel (2012: 1-3) 指出，若從全球化變遷的角度來切入，可以歸納出行動主義觀點中針對跨國移工與當代社會發展的關係，主要關注以下三個主題：(1) 全球性人口遷徙及社會變遷脈絡下關於公民權 (citizenship) 概念的重新思考；(2) 伴隨著人口跨國遷徙而興起的草根性反抗力量及其特有的行動方式；以及 (3) 上述兩種發展趨勢如何挑戰過往研究中對於社會運動政治意涵的討論。同時，行動主義觀點認為，諸如社會運動等各類具改革理念的個人或集體性社會行動，其目的不僅在於挑戰既有的社會制度及秩序，同時更意圖打破其背後的價值體系與意識形態，以追求更符合當代人權理念的進步社會。

依據此一精神，行動主義觀點強調，關於公民權的思考不應侷限於傳統法律或政治所定義的範疇中，而應該是一種開放性的概念，必須涵納各類缺乏正式公民身分的群體，以及其在不同階段中透過實質性的政治與社會參與，實踐公民權及公民參與的主張及行動（Nyers & Rygiel, 2012）。Johnson (2012: 119-120) 更指出，傳統社會運動往往將焦點置於國家體系中法定公民的政治行動，而忽略了非公民（包括難民、政治庇護者、短期性的跨國移工等）所具備的行動潛能及可能的貢獻。在此種思維下，即使是一些攸關移住族群權益的倡議及改革行動，都是藉由法定公民以「代言人」的身分為非公民族群發聲；這樣的社會行動模式所彰顯的是一種主從 (clientelist) 關係，因而可能削弱政治發聲的能量。

因此，以行動主義為據的社會運動主張，在關於跨國移住族群權益的倡議及抗爭場域中，核心的關懷不應是特定群體的政治身分 (political being)，而是對於這些非法定公民主體性與能動力的肯認，並將其視為社會行動的中心角色（Nyers, 2009）。至於所謂的法定公民，例如居留社會的當地民眾，則應是與非法定公民站在同等的位

置，一起共同發聲及行動不可或缺的「夥伴」(partner)關係，而非扮演代言人的角色。因此，雖然跨國移工並不具有居留國社會法定的公民身分，然而仍可藉由短期或中期、具主體性的社會參與行動，主動地投入各類普世性人權的抗爭，從中開拓出另一種形式的公民參與及實踐空間。

若從行動主義觀點來觀察全球各地跨國移工的社會參與個案，可以綜合歸納出以下幾種特性及思考脈絡(Keck & Sikkink, 1998; Khagram, Riker, & Sikkink, 2002; Milkman, 2000; Munck, 2010; Tsutsui, 2004)。首先，在當代全球生產鏈模式的背景之下，跨國移工透過各種流動與移住方式，在輸出國與流入國之間持續參與全球社會的變化過程，其政治行動及社會參與所彰顯的，是一種跨越國界與疆域的組織及動員模式。其次，全球各地跨國移工所面臨的勞動與人權問題，乃至相應的解決方案，均與居留國中市民社會的發展型態息息相關，是「在地」為中心的社會參與。再者，行動主義觀點重視不同文化社群之間的相互連結，因此，跨國移工雖然存在者種族、宗教、文化與意識形態上的差異，然其介入居留國社會的方式很難是單打獨鬥，而是有賴社群間可能的內部連結及外部協力，其中也包括與居留國在地資源的合作。此外，此種觀點也主張，跨國移工不應被視為是一種整體性(monolithic)、同質性(homogeneous)的族群或階級類屬，而是具有多元歷史與文化殊異性的不同組合體，此種文化背景的多樣性也無可避免地影響跨國移工介入居留國社會的方式及型態。

整體而言，關於跨國移住者行動主義的論述及相關研究透露出，跨國移工並非純然如馬克思主義所言，是政治經濟結構下飽受壓迫、無能為力的受害者，也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派眼中在全球市場上被頻繁交易的類經濟商品，而是可以成為具有自主性與能動性的積極行動者。其中，決定跨國移工社會行動的關鍵之一，即在於其如何與居留國社會在地資源進行連結及合作，特別是透過各類媒體近用的途徑取得發聲權及發聲位置。近年來一些以跨國移住社群為觀察的研究即指出，跨國移工或移民得以利用另類媒體內容的生產與流通，來維持其族群與文化的主體性，並且主動介入、參與居留國的公共事務(Appadurai, 1996; Athique, 2005; Husband, 2000; Lee, 2012; Prey, 2011)。這類以跨國移住族群為主體的草根性媒體，除了具備族群聯繫與民族認同的功能之外，更形構出一處「對抗性公共領域」

(counterpublic sphere) (Lee, 2013)，成為移住族群參與居留國社會公共事務的重要基地。

除此之外，過去不少研究也發現，當代跨國移住族群藉由各種獨立媒體或社群媒體的近用，與其所屬的文化社群、其他移住社群、移入國當地社會進行溝通及互動，並且組織起緊密的社群網絡，是其在移入國社會中重要的支援系統 (Kosnick, 2007; Mitra, 2005; Nyers & Rygiel, 2012)。此種以移住族群為主體的草根性媒體組織，對於不具居留國法定公民身分、停留時間有限、缺乏在地網絡與資源的跨國移工而言，更是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除了作為連結不同社群的中心，同時也讓處於居留國邊緣位置的跨國移工們，得以藉由此類移住者媒體所提供的團體培力彰顯動能，由內而外逐步地涉入居留國社會的公共場域，成為具積極性社會參與能力的行動者。更重要的是，藉由新興傳播科技的使用，原本散布於全球各地、型態各異的移住者草根社會行動得以被串連起來，打破以政治身分與法定公民為據的公民權思維，轉而形構一種以「世界性想像」(cosmopolitan imagination) 為基礎的「文化公民」身分與認同空間，開拓出跨國／境行動主義的政治倡議及社會參與途徑。

二、南韓的移工政策與方案

在 1980 年代以前，南韓主要是勞動力輸出國，每年約有三萬南韓人民以低階勞動力的身分赴海外（主要集中於歐洲及中東地區），從事營建與看護等工作 (Y. Park, 1994)。而在 1980 年代末期，受到國內政治環境與經濟發展政策的影響，南韓從勞動力輸出國逐步轉型為勞動力輸入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目前南韓已經成為亞洲跨國移工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而在跨國移工人口的組成上，則以東南亞籍及中國籍占多數，另外也包括不少來自南亞及中亞地區的移工。

自 1980 年代開始，南韓政府持續針對國家整體產業發展方向進行檢討，在改革的旗幟下全力推動「經濟集中化」政策的施行，透過資源的重新分配，積極鼓勵國內少數重點企業的發展，因此在產業結構上逐步從中小型製造業轉型為大企業與重工業導向 (W.-B. Kim, 2004; Seoul, 2000)。國家產業政策的轉向，雖然成功地帶動了南韓總體經濟的成長，但此種偏向扶植大型財閥的政策思維，卻也對國內

眾多的中小規模製造業造成極大的衝擊，不僅面臨前所未有的經營困境，更在全球市場上失去原有的競爭優勢。

南韓學者 W.-W. Park (2002) 指出，自 1987 年以降，南韓製造業的薪資水準以每年 20.7% 的增幅急遽上升，使得中小規模製造業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雪上加霜。為了緩和人力成本的支出，部分小型企業被迫歇業、關閉，或是遷移至勞動力較為低廉的國家。然而，對於一些缺乏移動條件或具有服務時間效益的產業，轉向海外發展並不可行，因此仍需仰賴在地的勞動力。為了緩和國內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南韓政府自 1990 年代初期在政策上進行調整，開始有系統性地引進跨國移工。A. E. Kim (2009) 的研究發現，南韓的跨國移工人數由 1994 年的 33,861 人開始一路增加，至 2008 年時，持工作簽證於南韓居留的外籍人口已超過 70 萬人，成長速度驚人。這些屬於低階勞動力的跨國移工通常被安排於農業、漁業、營建業，以及所謂的 3D 手工業，或是其他中、小規模的製造業工作 (W.-B. Kim, 2004; Seol, 2000)。

上述學者普遍認為，經濟結構上的勞動力短缺以及政治態度上嚴格的移民政策，造成過去二十多年來南韓跨國移工管理問題層出不窮，特別是因勞動規範的缺失所導致的大量逃跑、無證照及非法移工，一直以來更是引發社會大眾持續的關注及討論。1990 年代初期開始，為了解決小型與中型工廠的人力短缺，南韓政府一方面透過「外國人產業與技術培訓方案」(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Training Program for Foreigners, 簡稱 ITTP) 的頒布與施行，以「產業培訓員」(industrial trainee) 的名義，每年固定引進一定數量的跨國移工；另一方面，卻也同時藉由「短期雇用」政策的嚴格執行，來控制該國內跨國移工的數量，並且阻卻移工獲得長期居留權的機會。

W.-W. Park (2002) 即指出，「外國人產業與技術培訓方案」的其中一項重要原則，即在於避免跨國移工長期居留的可能性，因而強迫其只能先以培訓員的身分進入南韓，在相對低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並且在南韓境內的工作期限相當短，由此也衍生出不少勞動權益的爭議。其中，因此項方案規劃不周而導致的大量逃跑、非法移工問題更是屢見不鮮。根據 Moon (2015) 的研究，以 2015 年為例，各類外來人口在南韓居留人數共 1,813,037 人；而在低技術性與非技術性跨國移工方面，則包括了取得合法工作簽證者 503,135 人，以及未擁有工作簽證、非法工作者 64,507 人。因此，隨著大批跨國移工持

續進入南韓社會，在各類勞動場域中隨處可見，而在大眾媒體開始針對移工惡劣的勞動環境進行報導，加上社會各界對移工合法身分與勞動權益的多方討論之下，針對跨國移工的勞動條件及管理措施的改革訴求逐漸浮上檯面，成為南韓備受矚目的一項社會議題（A. E. Kim, 2009；Lim, 2003；W.-W. Park, 2002）。

根據南韓學者 A. E. Kim（2009: 4-6）的綜合歸納，在跨國勞動力的引進與管理上，南韓政府主要制定了四種不同的方案與工作許可證發放形式，用以管理並控制境內跨國勞動者的流入及居留，包括以外國專業工作者為對象的「專業工作許可方案」（Professional Work Permit System, PWPS）、針對低技術性海外韓國人的「就業管理方案」（Employment Management System, EMS），以及適用於非技術性與低技術性外籍移工的「產業培訓方案」（Industrial Training System, ITS）與「就業許可方案」（Employment Permit System, EPS）。各項方案的適用對象、實施年度及相關管理內容參見表 1。

A. E. Kim（2009）認為，南韓的工作許可方案針對兩種不同類型的跨國勞動力設定相當差異化的條件和權利規範，即「技術性移工」與「低技術性／非技術性移工」。^[2]基本上，相較於低技術性與非技術性移工，技術性移工的規範明顯較為彈性寬鬆。一般而言，南韓政府並不設定「專業工作許可方案」中外國專業工作者的簽證發放數量，然而對於特定產業所需要的低技術性與非技術性移工，則是設下重重的簽證配額管制，並且明訂其居留的期限與工作管理規範。若就與低技術性／非技術性勞動力息息相關的「產業培訓方案」及「就業許可方案」相關規範內容加以審視，更不難看出南韓政府對於藍領跨國移工所抱持的嚴密管理思維。

其中，「就業許可方案」之設計初衷，即在於取代自 1994 年開始施行後問題百出的「產業培訓方案」。若與「產業培訓方案」相比較，此項新方案給予跨國移工較為合理的待遇，包括刪除所謂「培訓期」的規定，並且提供跨國移工基本的勞動權益保障、法定最低薪資、就業保險等，以確保南韓基礎勞動市場穩定的人力供應。該方案正式實施後，在社會輿論的要求下，將跨國移工於南韓受雇工作的年限小幅度放寬，規定工作滿三年之後，得申請延長一年又十個月，亦即最長可於南韓合法工作四年又十個月。2011 年時，南韓政府再度修正「就業許可方案」，補充了跨國移工「重新入境就業方案」（Re-Entry

表 1：南韓跨國勞動力引進與管理相關方案內容

方案	內容			
	對象	實施年度	相關內容	停留期間
PWPM	外國專業工作者	現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教師、工程師、藝術工作者與高階經理人等白領外國勞動力。 2. 彈性管制，未設定簽證數量。 	較彈性
EMS	擁有外國國籍的海外韓國人	2002 年 12 月至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適用於年滿 25 歲、有居住在南韓親屬的海外韓國人。 2. 以餐旅業、清潔服務、家務助手等低技術性職業類別為主。 3. 持工作證可於南韓境內停留三年。 	三年
ITS	低技術／非技術性跨國移工	1994 年 1 月至 2007 年 1 月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包含一年的培訓期及兩年的合法工作期程。培訓員於完成一年的培訓計畫後，方有資格申請正式的工作許可證。 2. 培訓員初期主要的工作類別為製造業、營建業、農業、近海和沿海漁業等。 3. 培訓期間未受勞動基準法保護，薪資低、工時長、無加班費，從而衍生出各類勞資糾紛及逃跑外勞問題。 	三年
EPS	低技術／非技術性跨國移工	2004 年 8 月至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取代 ITS，提供跨國勞工較合理的勞動待遇，如就業保險、法定最低薪資保障等。 2. 規定移工招募與訓練各階段過程都應受到政府機構嚴謹的管控。 3. 禁止更換工作地點，並且最長只能在南韓工作三年。 	三年 (現為四年十個月)

資料來源：“Demography, 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South Korea,” by A. E. Kim, 2009. *The Asian Pacific Journal*, 7(6), 1-18. 本研究整理製表。

Employment System)，允許跨國移工在第一次聘雇期（共四年又十個月）結束返回原生國後，得在原雇主願意繼續聘雇的情況下，重新申請入境南韓工作。

自 2004 年 8 月施行以來，過去十多年間至少有數十萬的低技術性／非技術性跨國移工藉由「就業許可方案」的申請，取得 E-9 簽證進入南韓工作。不過，依據南韓政府於 2003 年所頒布，用以規範各類跨國勞動力施行方案的「外國勞工聘僱法」（The Act of Foreign Workers' Employment），「產業培訓方案」與「就業許可方案」主要適用於短期性跨國勞動力的聘雇。而所謂「短期聘雇」的相關規定，

除了適用該方案的跨國移工只能短期工作與居留之外，其所持的 E-9 簽證只限於在南韓境內工作，且在聘雇期間內不得轉換雇主及工作地點。在工作屬性方面，持 E-9 簽證的跨國移工也被嚴格規範，只能從事非專業性、低技術性的工作，包括製造業、營建業、農林畜牧業、近海養殖漁業等範疇。

綜上所述，自 1990 年代迄今，南韓政府透過不同跨國勞動力管理方案的制定及實施，每年持續自海外引進數十萬名的藍領移工；這些從事低技術性與非技術性的跨國移工不但提供了南韓經濟發展所亟需的基層勞動力，也是參與該國社會轉型與變遷過程的重要成員。然而，從上述討論可以發現，如同 W.-W. Park (2002)、N. H.-J. Kim (2008) 以及 Lee (2012) 等人所指出的，南韓跨國移工引進與管理方案是以經濟為導向、控制為依歸，其中存在著幾項共同的思維：(1) 以低階勞動力為主；(2) 在移工的來源國與族裔背景上避免過於集中；(3) 主要是針對南韓雇主的需求而設計；(4) 以南韓國內經濟發展的利益最大化為前提；以及 (5) 跨國移工只能短暫停留，是南韓社會中永遠的過客，沒有機會成為長久的居留者。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全球化國際人口遷徙的背景下，「移住者媒體」(migrant media) 提供予跨國移工及各類移住族群的媒體參與及培力空間，以及其所彰顯出的社會行動意涵。本研究將包括跨國移工在內的各類跨國移住者視為多元文化社會變遷過程中的參與者，關注的焦點在於南韓社會中跨國移住者所面對的勞動與移住政策等結構性問題，以及在此種結構限制之下，南韓境內的跨國移住者如何藉由草根媒體的近用及培力，取得對外發聲與串連的管道，並且從中實踐行動主義取向的社會參與。

具體而言，本研究希望藉由南韓「移住者世界電視」(MWTV) 成立及發展過程的考察，探討下列研究問題：

- (1) 作為草根性媒體組織，「移住者世界電視」如何開拓各類跨國移住者的媒體參與及培力空間？
- (2) 「移住者世界電視」如何面對及因應南韓多元文化社會變遷過程中各類外部因素的影響？

(3) 「移住者世界電視」的發展經驗彰顯出何種社會行動主義意涵？

在研究方法及設計部分，本研究一方面從鉅觀層面上，藉由相關文獻資料與官方檔案的蒐集、耙梳，檢視近年來南韓在跨國勞動力政策方案與多元文化思維之發展現況；另一方面則透過對「移住者世界電視」（MWTV）組織的個案追蹤觀察，發掘以跨國移住族群為主體之媒體培力及社會行動途徑，並且從中思考其對於當代多元文化社會發展與族群傳播所具有的意義。

為了深入瞭解「移住者世界電視」在南韓的在地發展歷程，研究者於 2011 年四月、2014 年四月與 2016 年十月三度前往南韓，走訪「移住者世界電視」位於首爾的辦公室，並且訪談組織負責人及相關工作人員。除了親身訪談之外，同時也藉由實地觀察該組織在媒體內容產製及教育培訓的日常流程，以瞭解南韓境內的跨國移工與新移民如何藉由移住者媒體的培力，產製與移住社群相關的媒體內容。此外，本研究同時也關注「移住者世界電視」作為一個草根性的獨立媒體組織，如何在南韓社會變遷過程中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之下，持續發揮移住者媒體的功能。

本研究前後共訪談五位「移住者世界電視」組織工作人員，受訪對象資料參見表 2。五位受訪者均具備基本英語溝通能力，因此訪談過程主要以英語進行，輔以部分韓語；韓語部分由隨行翻譯員於現場轉譯為中文或英文，協助研究者與訪談對象進行溝通，並在訪談結束後整理成中文逐字稿。每次訪談約進行 1.5 至 2.5 小時。三次訪談內容依本研究之進程略有不同，訪談問題主要置焦於「移住者世界電視」成立的相關背景、跨國移住者參與媒體內容產製的方式、歷年來不同階段的發展重心與運作模式、組織過去十年中與南韓官方與民間社會的實際互動情形，以及所面臨的困境與因應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於 2011 年至 2016 三度前往「移住者世界

表 2：受訪對象相關資料

受訪者	受訪者職務	訪談日期
A	理事長兼發言人	2011.04.02
B	節目製作人、媒體培訓計畫負責人	2014.04.05
C	理事、諮詢顧問	2016.10.08
D	理事長兼發言人	2016.10.09
E	節目製作人、移住者世界影展負責人	2016.10.09

電視」進行訪談，在此六年期間，該組織的辦公室經歷了兩度搬遷，而組織的主要負責人（理事長）也已經過兩次改選。除了親身訪談之外，研究者也在過程中觀察到該組織在不同階段中媒體內容產製型態的轉變，以及相關硬體設備的大幅更易，特別是在 2016 年的訪談行程中，得以親自參與其廣播節目的即時製播過程。此種組織內部結構與營運方向的變化，與過去六年來「移住者世界電視」所遭逢南韓政治與社會變遷上的外部因素有重大的關聯，同時也提供本研究從歷時性的角度觀察「移住者世界電視」在南韓的發展過程，從中檢視移住者媒體在社會行動過程中所可能面臨的挑戰及因應方式。

肆、「移住者世界電視」（MWTV）的迢迢十年路

一、從街頭走向媒體——在基進中尋找發聲之路

MWTV 是在 2005 年由南韓多名跨國移工、難民與社會運動者共同創立的媒體組織，依據其成員的背景及所服務的對象，命名為「移工電視」（Migrant Workers' Television, MWTV）。^[3] 該組織之成立，源自幾位來自東南亞與南亞國家的移工，因有感於在異鄉生活的苦悶及在南韓工作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組成「停止鎮壓」（STOP CRACKDOWN）樂團，一方面藉著演唱母語歌曲抒發鄉愁，另一方面也透過詞曲創作，傳達跨國移工在南韓所面臨的各種惡劣處境。

「停止鎮壓」樂團的主要團員除了都具有移工或難民身分，同時也是南韓社會改革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為了讓樂團所創作的歌曲得以廣泛傳布，加上對於南韓主流媒體長期對跨國移工刻板、負面、扭曲報導方式的不滿，因而選擇透過公共近用頻道傳送樂團的音樂表演，自此也開啟了 MWTV 的創立之路。

在南韓族群媒體（ethnic media）的發展史上，MWTV 的出現可謂一項相當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曾任該組織理事長、來自緬甸的政治難民，同時也是 MWTV 草創者之一的受訪者 A 表示，MWTV 成立的初衷，是要給予在南韓的跨國移工一個「發聲」的媒體管道，向主流社會大眾傳達來自移工社群內部的聲音與需求，希望透過來自不同國家，包括孟加拉、尼泊爾、緬甸、蒙古、中國、印尼、菲律賓、俄羅斯等地的移工，以及南韓國內勞工與社運團體的相互串連，共同為在南韓生活的國際移工發聲。

該組織目前的章程上明白揭示：「MWTV 是由在南韓的跨國移住者（transnational migrants）所成立的非營利組織，目地在於廣泛蒐集跨國移住者的聲音，並且提升各類移住社群之間的溝通」。依據此一宗旨，「在 MWTV 中，來自各國的移住者與韓國公民共同製作各類不同的節目，以喚起大眾對於跨國移住者人權的關注，並且確保跨國移住者的各項權益」。換言之，MWTV 的創立，主要是希望讓南韓境內的各類跨國移住者取得自我發聲的管道，以及提升其社會、文化與政治權益。因此，除了節目內容的製播之外，MWTV 也積極推動各類文化活動，包括媒體教育訓練、移住者影展、多元文化教育，以促使南韓朝向不同族群間相互瞭解與尊重的多元文化社會發展。

在此組織宗旨下，MWTV 在成立初期所製作的節目內容主要以新聞類型為主，包括新聞週報、移工家鄉新聞、各類勞動議題，以及南韓國內的重要新聞事件等，提供在南韓工作、居留的跨國移工收看。受訪者 A 提到，從 2005 年成立以來，南韓政府曾經不斷地打壓 MWTV 相關工作人員，試圖將參與組織事務的跨國移工及難民成員驅逐出境。其中最受注目的事件即是 2009 年時，MWTV 創始者之一、長期活躍於社會運動的移工 Minod Moktan，遭到南韓政府以長期非法滯留的罪名逮捕，旋即遣返回其原生國尼泊爾，此舉引發了社會大眾之熱議（Lee, 2012）。受訪者 A 也表示：「有好幾年的時間，我自己就曾經很多次差點就被遣返回緬甸」；然而，在南韓民間團體與人權組織持續的抗議聲浪中，該組織得以持續運作，並且製播提供各類移住族群收看的節目內容。

MWTV 組織於 2005 年成立之後，起初以極為克難的方式推廣樂團的音樂表演，同時發動數波針對「就業管理方案」（EPS）施行弊端的群眾抗議活動；隔年，在南韓幾個民間團體與獨立媒體機構 MediAct 的協助下，取得公共近用頻道 RTV（Revolution TV）的衛星電視服務許可，於是開始了電視節目內容的製作與播送。^[4] 南韓學者 Lee（2013）指出，此時期的 MWTV 固定製播兩個招牌性節目，其一為《多語言移工新聞》（Multilingual Migrant Worker News，簡稱 MW News），其二為《移工世界》（The World of Migrant Workers，簡稱 WMW），即是為了彰顯《移工電視》的設立宗旨與核心精神。

其中，《多語言移工新聞》為一使用多國不同語言所製播的新聞節目，全盛時期共涵蓋 13 種不同語言（受訪者 A），包括緬甸語、

尼泊爾語、孟加拉語、俄羅斯語、印尼語、菲律賓語、蒙古語、中國語、英語及韓語等，以服務南韓境內不同國籍、種族以及語言背景的跨國移工。《移工世界》則屬一以韓語製播的論壇性節目，該節目透過主持人與來賓針對攸關移住社群權益的各類重要議題，以主題為單元進行深入的討論。受訪者 B 表示，不同於南韓主流媒體所製播的「多元文化」節目，MWTV 的節目幾乎均由跨國移住社群成員自製，節目所訴求的閱聽眾主要亦為南韓境內的各類移住族群。再者，MWTV 所製播的新聞與論壇節目，主要聚焦於與移住社群切身相關的事務，在觀點上也與官方或主流媒體大不相同，具有強烈的批判色彩，不時對南韓政府的政策思維提出檢討。

透過 RTV 的協助，MWTV 的自製節目開始於有線電視頻道 SkyLife531 播送。自 2006 年開播之後，MWTV 的節目成為 RTV 頻道系統中最受注目的節目之一。受訪者 A 提到：

盧武鉉政府非常支持 RTV，所以當時的 RTV 規模很大，擁有充足的製播器材及設備，我們這些外籍勞動者就在那邊學習基本電視節目製作技術，以及借用他們的棚內設備。然後我們就製作《多語言移工新聞》，那時候是 13 種不同語言的新聞報導節目。我們也開始製作了《移工世界》，透過這個節目持續談論韓國社會中外籍勞動者的生活與社會議題，每兩周製作一次，固定時間播出。（受訪者 A，2011.04.02）

在 RTV 提供節目製播設備與技術的協助下，MWTV 逐步確立其作為指標性「移住者媒體」的角色定位，成為南韓廣受矚目的一個另類媒體組織（Suzuki, Yonetani, & Hyun, 2006）。受訪者 B 指出：

因為 RTV 本身是一個開放一般市民參與的公共頻道，所以他們提供我們的是製作技術的支援和固定的播出時段，持續一段時間之後，（南韓）社會開始注意到了我們。（受訪者 B，2014.04.05）

除了 RTV 在各類軟、硬體的資源挹注及節目代理費之外，此時

的 MWTV 同時也透過多重的管道籌措組織運作所需的經費，包括向公部門申請媒體內容製作計畫補助，以及與其他民間團體合作、共同承接多元文化推廣相關計畫案等。不過，幾位受訪者都明白表示，作為一個小規模且三不五時與南韓政府「唱反調」的獨立媒體組織，MWTV 在公部門的資源爭取上一直是困難重重，除了固定的媒體培訓計畫及移住者世界影展活動之外，組織經費的來源主要仍有賴積極的對外募款，以及來自南韓各界關心移住社群的團體與個人捐款。

二、與 RTV 合作生變——從衛星電視服務走向網路與社群媒體平台

在此種組織規模及窘困的財務狀況下，MWTV 自創立以來即面臨相當大的經營困境，特別是在 2008 年南韓總統大選，由保守派右翼的大國家黨所推舉的候選人李明博勝選取得政權之後，MWTV 更是面臨前所未有的存續危機。不同於盧武鉉政府對於南韓境內弱勢族群與公民團體的支持，李明博出身企業集團的背景，使其在施政方向上偏向維護財閥利益並以經濟發展為依歸，南韓境內許多的非營利組織及公民團體都遭逢政府在補助經費上的大幅刪減，而 MWTV 批判當道與社會改革傾向的組織調性，自然成了南韓政府所不歡迎的對象。

除了公部門經費的刪減之外，當時的 RTV 也跟著緊縮預算，大幅降低對 MWTV 在設備與財務上的支援。受訪者 A 回憶道：

2008 年新政府上台後，我們曾經歷過一場危機，當時我們手上只剩下三個月的經費……幸好在面臨危機時都有遇到貴人相助，像是 Beautiful Foundation……李明博上台後，沒有任何的支援，RTV 被搬移到很小的辦公室，我們（MWTV）也從 RTV 內的空間搬出來，而且換新政府以後，RTV 的很多設備也都沒有了……。（受訪者 A，2011.04.02）

因此，MWTV 與 RTV 的合作關係在 2009 年之後生變，雙方的契約關係由固定的節目代理轉為零星的節目播送，製播多年且口碑良好的《移工世界》被迫喊停。幸運的是，透過民間公益組織 Beautiful Foundation 在財務上的挹注，MWTV 得以藉由專案計畫的申請，持

續製作《多語言移工新聞》節目。不過，也由於與 RTV 關係的變化，此時期的 MWTV 開始逐步將發展重心由衛星電視頻道播送系統轉移至網際網路的經營之上，建構起 MWTV 的官方網站（www.mwvtv.kr），並且調整節目的製作及傳布方式，例如規劃隨選播出的《影音網路新聞》（Video Web News），著重官方網站上影音內容的更新，並將網際網路視為與南韓境內跨國移住族群溝通、聯繫的主要平台。

MWTV 將經營重心轉移至網際網路平台上的決定，除了與 RTV 合作關係的轉變之外，也與南韓新一代跨國移住者在資訊搜尋及媒體使用上的特性息息相關。受訪者 A 指出：

我們注意到一點，這幾年網路已經成為在韓國的外籍勞動者最重要的媒體了。以緬甸籍的外籍勞動者來說，每個人到了韓國之後，都會想辦法弄到一台筆電，手機的話更是人手一台，用來打電話給家人，或是上網查各種資訊……最近來韓國的外籍勞動者都很年輕，他們都對新科技電子產品很有興趣，很多人都很想買 iPhone……。 （受訪者 A，2011.04.02）

換言之，即使 2011 年時 MWTV 仍透過 SkyLife531 頻道，固定於每週播放自製的節目內容，但同時亦察覺到新型態媒體科技已悄悄地進入南韓跨國移住者的日常生活中，成了 MWTV 作為一個移住者媒體組織，在內容生產、傳布及溝通策略上不得不隨之革新的重要訊號。

網際網路的開放性、連結性及大量的資料儲存空間，也讓 MWTV 得以在新聞性節目的產製之外，進一步藉由新傳播科技的助力，開發出更多元與即時的内容及服務。在 MWTV 的官方網站中，除了定期將《多語言移工新聞》內容上傳建檔，提供使用者以隨選方式收看之外，MWTV 也嘗試開發新型態的影音網路新聞，鼓勵南韓境內的跨國移工與移民族群提供自行拍攝的影像紀錄資料，在官方網站上進行播放。

除了影音內容的製播，MWTV 更將其網站視為跨國移住社群在南韓的資訊窗口，提供網站瀏覽者以超連結的方式，以 MWTV 官網為中心，向外連結至各類與移住社群相關的官方機構及民間團體網站，例如移住者輔導機關、南韓外國人服務中心、勞動團體、工會，

以及其他移住團體的線上社群等。受訪者 C 認為，在過去幾年的經驗中，MWTV 意識到網路平台所具備的對外連結性，是以往節目所主要依賴的公共近用頻道所望塵莫及的，「很多來韓國的移工們其實並不知道 Skylife 頻道在哪，也沒有時間去收看節目，但是網站就不同了，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很輕易地找到，而且隨時可以上去看看」。因此，藉由網際網路平台的開發與經營，MWTV 不但得以透過「友好網站」的超連結，與其他南韓境內、甚至海外的非營利組織及公民團體維持緊密的關係，同時更提供了跨國移住社群進一步連結的窗口，成了資訊傳布及互動交流最重要的一處場域。

傳播科技的演進，也推使 MWTV 在與南韓跨國移住者的溝通與聯繫上，不斷地往社群性媒體的方向進行變革，並且持續影響組織媒體內容產製的型態及規劃。受訪者 D 提到，2012 年時 MWTV 曾經一度面臨財務與會員流失的雙重危機，辦公室在四年間兩度搬遷，迫使組織重新思考經營策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當年度的理事們針對 MWTV 的營運召開危機處理會議，決議將組織的內容產製重心從電視節目的製作大幅轉為廣播節目的製播與教育培訓，藉由「播客」（podcasting）等新型態數位製播方式，與首爾市政府所管轄的 Seoul Live Radio Station、Seoul Community Radio 等公營電台進行合作，於每週固定時段播放 MWTV 所製作的廣播節目。^[5] 受訪者 C 指出：

現在的首爾市長因為是 NGO 出身，過去也曾經參加過一些社會改革運動，對於弱勢團體比較關注，也很重視社會服務方面的媒體內容，所以在態度上跟（朴槿惠）政府比較不同。
（受訪者 C，2016.10.08）

因此，自 2013 年以來，因為與 RTV 關係的漸行漸遠，MWTV 在電視節目製作上失去硬體設備的穩定支援，加上廣播節目在製作及播放平台上的漸趨穩定，目前固定製作的廣播節目成了該組織在媒體內容生產上的主力；2016 年起，更進一步在其官方網站及 facebook 專頁中建置起網路電台「MWTV FM」的線上收聽服務。

與此同時，網路及行動通訊社群媒體如 facebook、kakaotalk 與 line 的蔚為風行，也促使 MWTV 決定投入更多的資源在社群媒體的

經營之上，例如透過社群媒體的開放性空間，鼓勵跨國移住者上傳及分享自製的影音內容，並且規劃出以不同文化社群為主題的分眾性群組平台。針對社群媒體的應用，受訪者 D 抱持相當樂觀的態度：

我們認為社群媒體是 MWTV 發展更多元新聞與資訊的重要平台，也可以讓不同移住者團體之間的凝聚更加緊密，每一個團體緊密了，彼此合作就可以產生更大的力量。（受訪者 D，2016.10.09）

對 MWTV 而言，傳播科技的發展對於弱勢族群的權益保障及發聲能量具有正面的助益，也提升了各類跨國移住族群在南韓社會的能見度；而 MWTV 作為一獨立媒體，也必然需要隨著新傳播科技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善用社群媒體即時、開放、共享的傳播特性，從而體現其「廣泛蒐集跨國移住者的聲音，並且提升各移住社群之間的溝通」的組織目標。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發現，MWTV 在過去十年來面對南韓政治、社會乃至於傳播科技等外部因素的變化及衝擊，不斷地調整組織的經營重心與方向，其中最重要的轉變，還包括 2011 年時因應南韓跨國移住者人口組成的日形多樣化，於當年度 11 月的會員大會中決議，將組織正式名稱由「移工電視」（Migrant Workers' Television）更改為「移住者世界電視」（Migrant World Television），進一步擴大組織會員的招募及服務對象，以期能更具體展現移住者媒體的多元文化精神。

三、由內而外的民主參與——不只是內容生產者、更是政策倡議者

對於 MWTV 而言，作為一個以跨國移住者為主體的獨立媒體，在組織事務的推動上，強調各類移住社群成員的民主參與，同時也積極引進南韓民間的各種資源。以 2016 年而言，MWTV 共有約 140 名會員，包括來自不同國家的跨國移工、婚姻移民、外籍留學生及南韓公民。在組織事務的治理上，每年固定舉行會員大會，除了進行理事及理事長的選舉之外，也藉由會員大會的召開，由成員們共同商討各

項年度計畫。以 2015 年為例，該年度會員大會所選出的九名理事中，其中三人具有跨國移住者身分，一人為新移民的南韓籍配偶，另五人為韓國公民。在組織行政事務的運作上，目前編制內的員工共七人，包括兩位理事長兼發言人（一為移住者代表、一為韓國人代表）、一位執行長，以及四位專案工作人員。七人之中，僅執行長為全職固定支薪者，另六人為兼職或專案約聘人員。

在 MWTV 中，組織內部的各項行政事務有賴理事會的合議與合作，不過在實際的決策過程中，組織內所有的工作成員乃至會員們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受訪者 D 即提到，MWTV 於 2012 年時因遭逢嚴重財務危機，加上新傳播科技如行動載具的普及造成部分會員流失，曾經特別召開緊急會議，會中廣泛蒐集理事及各會員的意見，重新定調組織未來的工作重點與營運方向，包括由電視節目內容製作轉向社區性廣播節目的開發，以及加強社群媒體內容的供應及串連等，都是在民主、開放的討論過程中所匯集而成的組織共識。

因此，身為 MWTV 的會員，來自不同國家的跨國移工、婚姻移民與部分留學生定期參與例行會議、製作媒體內容，並且協助籌劃各類活動（如年度「移住者世界影展」等）。除了跨國移住者之外，MWTV 的工作人員與會員也包含了不少南韓民眾。這些南韓民眾在 MWTV 媒體內容的產製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協助整理重要社會議題與新聞事件的文字稿，再由來自各國的移工與移民翻譯成不同的母語版本，透過 MWTV 的媒體平台播報傳布。其中，MWTV 曾經製播多年的《多語言移工新聞》即是藉由此種跨國移住族群與南韓民眾相互協力的方式，克服多重語言的障礙，開創出獨樹一幟的新聞節目類型，引發了南韓社會的關注。除此之外，不少南韓民眾也投入 MWTV 固定進行的媒體培訓計畫，包括影像紀錄的攝製、剪接等教學、紀錄片導演的培育，或是廣電節目內容製作技術的指導等工作。

在與外部社會的連結方面，MWTV 於 2012 年進行組織改造之後，深刻體認到南韓市民社會中各類改革力量的蓬勃發展；因此，除了持續組織本身長期所耕耘的內容產製、媒體教育培訓及多元文化活動推廣之外，更強調將跨國移住者的關懷向外拓展，與南韓境內不同的社會團體進行串聯與合作，強化組織在政策遊說及倡議上的角色功能。

基於此一組織發展目標，MWTV 設定的營運及發展主軸主要有以下幾個方向：

（一）移住者世界影展（Migrant World Film Festival）的持續推動

「移住者世界影展」為 MWTV 自創始階段即列為年度工作重點的一項活動，於每年 10 月舉辦，自 2007 年開辦以來已有十年的歷史。目前負責籌畫該影展活動的受訪者 E 表示，「移住者世界影展」的舉辦，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南韓境內從事影像記錄與創作的跨國移住者或是本國工作者一個「被看見」的機會；每年的影展中也固定邀請其他國家與移住者主題相關的影片，藉由國際之間觀摩、交流的方式，提供關心跨國移住者生活與社會處境的影像工作者一處相互對話及培力的場域。

以 2015 年為例，該年度的「移住者世界影展」於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18 日舉行，在為期三天的影展活動中，影展內的「移工單元」（Migrant Labor Section）共播放九部與跨國移工相關的國內、外影片。而最特別的是，受邀參展的九部影片中，其中兩部為 MWTV 透過媒體教育計畫所培訓出的移工擔任導演所拍攝的作品。受訪者 E 認為：

雖然影片的品質不是很好，但那不是重點，重要的是這些影片是誰拍的、是呈現誰的觀點。（受訪者 E，2016.10.09）

此外，MWTV 也期待透過「移住者世界影展」的舉辦，提醒南韓人民持續關注境內跨國移住者的生活處境及權益。受訪者 D 提到：

在影展中，我常看到韓國民眾在看完移工們拍攝的影片後倍受感動，覺得跟以往從媒體認知到的很不一樣，也開始關注他們在韓國的生活，所以我覺得這是 MWTV 非常重要的活動，未來也會持續辦下去。（受訪者 D，2016.10.09）

過去幾年，「移住者世界影展」每年約有 500 左右的觀影人次；而為了進一步提高該影展的社會影響力，近兩年 MWTV 更與多所大

學合作，選擇首爾市區內交通便捷的大學校園作為映演場地，藉以吸引更多南韓民眾參與影展活動。^[6]

（二）「移民政策論壇」（Immigration Policy Forum）作為外部串連的基地

MWTV 除了持續與南韓移住者協會（Migrant Trade Union）及境內移住者相關社會團體，例如移住者藝術與文化空間（Migrant Arts & Culture Space）、亞洲與離散中心（The Center for Asia & Diaspora）等以不同專案方式進行多元文化推廣活動之外，目前外部連結策略的主軸，在於透過積極參與「移民政策論壇」這個匯集南韓民間力量的大型組織活動，與南韓各類社會運動、人權組織、公民團體及學術界人士，共同商議跨國移住者在南韓所面臨的人權、法律及社會權益等重大議題。

受訪者 C 指出，「移民政策論壇」扮演了一個匯集南韓境內各方關心跨國移住者社會議題人士及團體的中心角色，「就像一把大傘，將不同的 NGO、改革性社團與社運人士集結起來，一同商議韓國跨國移住者政策與人權議題」。受訪者 D 也表示：

我們跟很多韓國從事移住者教育輔導的機構不同，我們做媒體教育訓練，是為了讓這些移工和婚姻移民學會使用媒體製作技能，去記錄、表達自己的聲音跟自己的觀點。除了這些，我們更重要的任務是參與示威遊行、政策倡議，這是我們跟韓國其他移住者輔導機構很不一樣的地方。（受訪者 D，2016.10.09）

換言之，從草根社會運動中竄起的 MWTV，雖然在過去十年中因面臨南韓政府對於移住社群態度上日趨保守，而在組織的營運方向上不得不因應整體社會情勢的變化而有所調整，然而仍堅持組織的「社會行動者」角色，積極介入政策的遊說與倡議，以爭取南韓境內各類跨國移住者應有的社會權益。

(三) 打造專業的移住者「網路媒體中心」(Internet Media Center)

2015 年 MWTV 正式註冊成為網路媒體，除了意識到數位匯流時代中網路媒體的強勢崛起之外，同時也發現網路新媒體在資訊交流、組織動員及經濟效益上，都具備較傳統媒體更大的發展空間。再者，網路新媒體的應用也更能反映韓國境內多元的移住者背景，得以提供不同種族、國籍、身分的移住者以小型「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 為單位，對內進行緊密的交流互動，對外則以議題為基礎進行廣泛的橫向串連。受訪者 D 認為：

韓國境內有來自各國的外籍勞動者，加上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婚姻移民，他們在韓國待的時間不一樣，所以我們希望根據移住者的背景，用不同的方式給予他們機會……網路提供了我們更多途徑去接近他們。(受訪者 D, 2016.10.09)

其中，現階段 MWTV 所進行的線上廣播節目製播與人員培訓，即是以此種「社區媒體」的概念出發，期待各類跨國移住者以自身的文化社群為核心，由內而外共同集結發聲，以呈現南韓社會豐富多元的移住者生活樣貌。

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E 並指出，長遠來看，未來 MWTV 期待能朝專業性移住者網路媒體中心的方向發展。無論是廣播、電視節目的製作、影像的記錄或是網路平台資訊的建置與擴充，MWTV 堅持其媒體培訓教育的主旨，在於藉由傳播科技的協助，提升南韓境內跨國移住者自我表述與發聲的權益，同時打造出一處跨越不同媒體平台的公共領域，讓跨國移住者與南韓公民得以更為親近，增進彼此的瞭解，從中體現多元文化社會的精神及內涵。

伍、綜合討論與結語

本研究透過南韓「移住者世界電視」(MWTV)發展歷程的考察，探討全球國際人口遷徙與變遷的背景之下，跨國移工與移民族群如何

藉由草根媒體與傳播科技的助益，翻轉在居留國社會中的邊緣位置，取得對外發聲的管道，並且藉由新型態移住者媒體的培力，開拓出以跨國移住者為主體的媒體參與空間及社會行動途徑。

本研究發現，「移住者世界電視」的成立及發展過程，充分彰顯了全球人口跨國遷徙脈絡下，行動主義取向的跨國移住者媒體參與及社會實踐意涵，並且可由以下幾個面向中加以觀察：

首先，「移住者世界電視」組織的成立宗旨及發展目標，具體體現了行動主義觀點中所揭示，對於跨國移住族群內在主體性、能動性，以及其所蘊藏的社會行動潛能之肯認（Munck, 2010；Nyers, 2009；Nyers & Rygiel, 2012；Tsutsui, 2004）。「移住者世界電視」的成立，是由來自不同國家、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跨國移工與政治難民主動地介入南韓社會的公共場域，藉著與民間改革力量的相互串連、合作，取得專屬媒體作為族群發聲的管道。在過去十年間，「移住者世界電視」在不同階段中，藉由原生媒體內容的產製、傳布以及集體性的社會行動，突破非法定公民身分的界線，積極地參與了南韓多元文化社會的轉型過程，扮演南韓境內各類移住族群與社會大眾得以認識差異、持續交流的橋樑。從過去十年的發展歷程來觀察，雖然「移住者世界電視」的出現主要源自對跨國移工權益的改革訴求，然而以其多年來所從事的活動來看，可以發現「移住者世界電視」所關注的並不侷限於移住社群的勞動權益，更包括了跨國性、普世性的人權與傳播權議題，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倡議。

其次，作為一個具社會改革意識的移住者媒體，「移住者世界電視」在組織架構上富含開放與包容的精神，廣納不同背景的移工、移民、留學生及南韓民眾的參與；而組織運作中所展現的民主參與特質，更是其與諸多依附於政府體制中的移住者輔導機構最大不同之處。從組織草創至今，儘管在內容產製平台與傳布策略上幾度更易，然其堅持由來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身分、國籍、種族與文化背景的跨國移住者共同參與媒體內容的生產，主動設定議題以對外發聲，並且善用南韓民間社會的各項支援系統。若就組織日常運作之各環節加以觀察，可以看出「移住者世界電視」試圖藉由平等、開放的「共議共決」機制，建構一處以跨國移住者為主體、民主參與為本位，具有團體培力功能的公共領域。在此公共領域中，組織成員得以從跨文化的角度，共同商議攸關移住社群的制度性議題，並且藉由媒體內容的

產製，在重要議題上取得發言權，挑戰南韓主流媒體及社會的偏見，呈現跨國移住社群內部的多元觀點。

再者，若就組織成員對外發聲及串連的策略而言，「移住者世界電視」同樣具體實踐了以跨國移住者為關照主體的行動主義精神。無論是從媒體內容的產製方式或是政策倡議的涉入過程來看，參與其中的成員並非是由菁英階級從上而下進行垂直動員的客體，也不是必須委由南韓市民社會予以定義及代言的對象，而是如同 Nyers (2009) 所言，在行動目標與實踐方式上，匯集不同文化社群的訴求，並且善用居留國社會中的各類夥伴關係及相關資源，共同協力以對外發聲，由內而外展現以參與者為主體的橫向溝通模式。在此種串連與合作的模式中，「移住者世界電視」作為一個行動主義導向的移住者媒體，不僅得以保有移住社群內部文化的異質性與多樣性，同時也不斷在與南韓各類社會團體互動的過程中確認自身的角色，除了是跨國移住社群與居留國社會間重要的文化中介者之外，更是具有自主性與能動性的積極社會行動者。

此外，在過去十年中，該組織從創始初期以跨國移工為主要的訴求對象，而後擴大組織的參與及服務範疇，廣納南韓境內不同身分的跨國移住族群，從「移工電視」轉型成「移住者世界電視」，反映出組織在發展過程中，因應外部環境變化而進行組織革新的內在動能。在組織的營運上，隨著傳播科技演進及新媒體平台的崛起，「移住者世界電視」從有線電視公共近用頻道的內容供應者，積極轉向網路社群與行動通訊平台的開發，試圖藉由傳播科技的助益，以「社區媒體」為核心，逐步擴展成專業的移住者網路媒體中心。此種組織發展方針及營運策略的動態性調整，也說明了「移住者世界電視」作為一個獨立媒體，在面對與南韓政府的緊張關係、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新一代移住者媒體近用型態改變的背景下，針對組織永續發展所展現的創新理念與行動動能。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移住者世界電視」作為一個草根性的移住者媒體，無論是在組織的成立宗旨、發展策略、參與成員、運作模式，或是與外部社會的互動模式上，皆體現了全球遷徙年代中，結合跨國性、在地性、連結性與民主參與特質的「移住者行動主義」(migrant activism) 內涵。除此之外，「移住者世界電視」的發展經驗也呼應諸如 Nyers & Rygiel (2012) 等行動主義學者的訴求，提供

了全球化發展脈絡下，關於公民權概念及公民社會參與的一種新的思考向度。自 2005 年成立至今，「移住者世界電視」除了持續扮演傳布「移住者之聲」（voice of migrant）的獨立媒體角色，同時更打造了一處跨國移住族群集體行動的重要基地；藉由移住者媒體的培力，各類跨國移住族群得以打破單一民族與國家的「政治身分」（political being）束縛，轉而以「文化公民」（cultural citizen）身分作為認同與行動的核心，開闢出一種新型態的媒體參與及社會實踐途徑。

在過去十年中，「移住者世界電視」在南韓相對嚴苛的移住方案結構限制下，以跨國移住者為主體，透過市民社會中不同資源的串連與協力，從移住社群內部向外延伸，凝聚成南韓重要的一股社會改革力量，其發展經驗擴充了族群傳播研究的面向，也引發了學術社群的討論。Prey（2011）認為，有別於過去以西方社會為中心的多元文化主義論述，「移住者世界電視」的個案展現出一種由下而上、與政府主導的多元文化主義（official multiculturalism）存在矛盾與緊張關係的「草根多元文化主義」（grassroots multiculturalism），提供了多元文化主義研究新的觀察角度。Lee（2012）則強調，「移住者世界電視」的個案凸顯出，決定跨國移住社群深度結盟與合作的關鍵，並非離散論述中所關注的共同語言或族裔背景等因素，而是來自其共享的階級意識與移住者身分（migrant identity）認同，並且在參與媒體內容產製與傳布的過程中不斷獲得確認。另外，透過「移住者世界電視」不同時期節目的內容分析，Lee（2013）也發現，「移住者世界電視」組織在南韓多元文化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具備雙重功能—對內以共享的階級意識與身分認同凝聚跨國移住社群，對外則扮演「對抗性公共媒介」（counterpublic medium）的角色，持續與南韓社會大眾進行溝通。

最後，本研究對於「移住者世界電視」的個案考察，主要是透過不同時期的機構訪談及資料分析，從歷時性的角度檢視其作為移住者媒體，如何在組織內、外部變遷因素的影響下，持續扮演社會行動者的角色，提升南韓跨國移住族群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權益。在跨地研究的多種客觀條件下，研究者無法於南韓進行長期的田野觀察，加上語言的障礙，未能針對「移住者世界電視」所產製的媒體內容文本進行分析，是本研究的一項限制。再者，本研究的受訪對象皆為「移住者世界電視」組織具代表性的重要幹部，囿於時間及人力限制，未能擴大訪談更多參與組織內容產製的移住者成員，以獲得更豐富的資

訊，亦為本研究有所不足之處。本研究認為，走過十年之路，「移住者世界電視」接下來的發展仍值得持續關注；而未來研究亦可進一步發掘全球各地不同的個案，以期更深入瞭解全球遷徙時代中移住者媒體的多元樣貌及其社會行動意涵。

註釋

- [1] 特別是一些非法停留的移工。W.-B. Kim (2004) 的研究指出，此類非法延長居留的移工曾一度占了南韓境內跨國移工人數超過五成之多。
- [2] 此處所謂的「技術性移工」主要為白領階級的外國專業工作者，而「低技術性移工」與「非技術性移工」則多為從事 3D 工作的跨國藍領勞動者。
- [3] 該組織於 2011 年經會員大會決議，全名由 Migrant Workers Television 更改為 Migrant World Television，以反映南韓跨國移住族群的多樣性，包括日益增加的婚姻移民與留學生等，組織對外名稱則仍維持 MWTV。
- [4] RTV 為南韓公共近用頻道系統，長期致力於提供各少數與弱勢團體媒體近用的機會，2006 年時主動與 MWTV 接觸，提議將其製作的節目納入系統中，並且提供各類節目製播設備供 MWTV 租借使用。
- [5] 以 2016 年為例，Seoul Live Radio Station 每週固定四天，於晨間時段播放 MWTV 所製作的廣播節目。
- [6] 例如 2016 年 10 月的「移住者世界影展」便選擇於首爾市區內的梨花女子大學進行。

參考書目

- 中華民國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 (2013.03.05)。〈新加坡引進外籍勞工模式〉。上網日期：2016年8月20日，取自 <http://twbusiness.nat.gov.tw/files/201303/1020314SGnews.pdf>
- 行政院勞動部 (2016)。〈勞動統計月報：統計表——外籍工作者〉。上網日期：2016年10月1日，取自 <http://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453/>
- 行政院內政部統計處 (2016)。〈內政統計月報：外來人口居留人數〉。上網日期：2016年10月1日，取自 <http://sowf.moi.gov.tw/stat/month/list.htm>
-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thique, A. (2005). Watching Indian movies in Australia: Media, community and consumption. *South Asian Popular Culture*, 3(2), 117-133.
- Castles, S., & Miller, M. J. (200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3rd ed.). New York: Guilford.
- Choi, K., Hong, K., Hahn, C.-h., Lim, K.-M., Moon, H., Park, C., et al. (2003). *Population aging in Korea: Economic impact and policy issues*. Retrieved August 25, 2016, from https://www.kdi.re.kr/kdi_eng/publication/publication_view.jsp?pub_no=8541
- Gurowitz, A. (2000). Migrant rights and activism in Malaysia: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4), 863-888.
- Han, K. S. (2003). Making others: Representation of foreign migrant workers in Korea. *Comparative Cultural Research*, 9(2), 157-193.
- Husband, C. (2000). Media and public sphere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In S. Cottle (Ed.),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pp. 199-214).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H. (2012). Moments of solidarity, migrant activism and (non) citizens at global borders: Political agency at Tanzanian refugee

- camps, Australian detention centres and European borders. In P. Nyers & K. Rygiel (Eds.), *Citizenship, migrant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vement* (pp. 109-128). London: Routledge.
- Keck, M. E., & Sikkink, 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hagram, S., Riker, J. V., & Sikkink, K. (2002).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im, A. E. (2009). Demography, 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South Korea. *The Asian Pacific Journal*, 7(6), 1-18.
- Kim, N. H.-J. (2008). Korean immigration policy changes and the political liberals' dilemm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2(3), 576-596.
- Kim, W.-B. (2004). Migration of foreign workers into South Korea: From periphery to semi-periphery in the global labor market. *Asian Survey*, 44(2), 316-335.
- Kosnick, K. (2007). *Migrant media: Turkish broadcasting and multicultural politics in Berli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ee, H.-Y. (2012). At the crossroads of migrant workers, class, and media: A case study of migrant workers' television project. *Media, Cultural & Society*, 34(3), 312-327.
- Lee, H.-Y. (2013). Bonding and bridging migrant workers to Korean society: A study of Migrant Workers' Television as a counterpublic sphe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 2609-2629.
- Lim, T. C. (2003). Racing from the bottom in South Korea? The nexus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transnational migrants. *Asian Survey*, 43(3), 423-442.
- Matsaganis, M. D., Katz, V., & Ball-Rokeach, S. J. (2010). *Understanding ethnic media: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roles in economic and policy contex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ilkman, R. (2000). Immigrant organizing and the new labor movement in Los Angeles. *Critical Sociology*, 26(1), 59-81.
- Mitra, A. (2005). Creating immigrant identities in cybernetic space:

- Examples from a non-resident Indian websit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7(3), 371-390.
- Moon, K. H. S. (2015). *South Korea's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their political impac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Munck, R. (2010). Globalization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Global Labour Journal*, 1(2), 218-232.
- Ngo, B. (2008). Beyond “cultural clash” understandings of immigrant experiences. *Theory into Practice*, 47(1), 4-11.
- Nyers, P. (2009). *Securitizations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Routledge.
- Nyers, P., & Rygiel, K. (Eds.). (2012). *Citizenship, migrant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vement*. London: Routledge.
- Park, W.-W. (2002). The unwilling hosts: State, society, and the control of guest workers in South Korea. *Asian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8(4), 67-94.
- Park, Y. (1994). The turning point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Korea. *Asian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3(1), 149-174.
- Prey, R. (2011). Different takes: Migrant world televis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South Korea. *Global Media Journal*, 4(1), 109-125.
- Rigoni, I., & Saitta, E. (Eds.). (2013). *Mediat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ized public sphe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eol, D.-H. (2000). Past and present of foreign workers in Korea: 1987-2000. *Asian Solidarity Quarterly*, 2(2), 6-31.
- Suzuki, T. M., Yonetani, J., & Hyun, M. (2006). Korea's migrant workers find a voice on air. *AsiaRights*, 6, 1-6. Retrieved October 15, 2016, from <http://archives.cap.anu.edu.au/asiarightsjournal/AsiaRights%20Interview%20MWTV.pdf>
- Tsutsui, K. (2004).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ethnic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ociological Forum*, 19(1), 63-87.

Social Actions of Migrant Media: The Case Study on Migrant World Television in South Korea

Chun-Fu Chen*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ole Migrant World Television in South Korea pl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formed du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s well as the media's underlying meanings. Based on diachronic data obtained from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Migrant World Television is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communities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s and civil societies in South Korea and has initiated a form of active media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engagement for transnational migrants in the last decade. Through the empowerment of grass-roots migrant media, transnational migrants of various backgrounds have gained access to channels that allow their voices to be heard, enable the consolidation of social reform dynamics through mutual alliances, and facilitate active eng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

Keywords: activism, South Korea, Migrant World Television, migrant media, transnational migrant

*Chun-Fu Che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ew Taipei, Taiwan.

